

陈云对党史存史工作的重视与贡献

王 蕾

〔摘要〕准确翔实地存史，是做好中共党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前提，也是一项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连续性工作。陈云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高度重视党史存史工作。他准确翔实地积累、提供党史史料，求真务实地证明、甄别党史史料，大力推动党史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为保存党史史料、厘清党史过程和推动解决个人历史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在党史存史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今人认真学习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党史存史工作；资政育人；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D2-0；D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1798(2021)-02-0022-05

准确翔实地存史，是做好中共党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前提，也是一项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连续性工作。陈云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以高度的责任感重视党史存史工作，为保存党史史料、厘清党史过程和推动解决个人历史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重温陈云关于党史存史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当前做好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准确翔实地积累、提供党史史料

陈云及时详尽地积累党史史料的自觉性是一以贯之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就撰写和保存了许多第一手的重要史料，典型之一是《随军西行见闻录》。1934年10月，陈云作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参加长征。1935年，他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文章署名“廉臣”，于1936年在《全民月刊》（中共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上发表，后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是最早以亲历者角度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袖的文献。1985年遵义会议50周年之际，红旗出版社出版了署名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

录》单行本。后来，《陈云文选》第一卷将《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陈云在遵义会议上的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文的附录。《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所作，记叙了他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月、途经六省、行程一万二千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真实见闻与所思所想。这件文献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红军突破封锁线、转兵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涉及红军的俘虏政策、群众工作、民族政策等多方面内容，如在记叙红军与彝族关系时写道：“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①红军长征历经艰险，留下文字材料较少，故而，《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研究红军长征显得十分珍贵。另一件重要文献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一个深晚》。1932年冬天，陈云在帮助瞿秋白夫妇转移住处时面见过鲁迅。当时，陈云是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①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表团工作的陈云，署名“史平”在《救国时报》（中共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上发表纪念文章《一个深晚》，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笔触记叙了与鲁迅会见的经过。鉴于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之下，这方面的史实基本未见诸记载，因此，《一个深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不少新的情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随军西行见闻录》和《一个深晚》都是当时人记载当时事，其内容较几十年后再来回忆的文章更加真实清晰，较少讹误和含糊不清的地方。

陈云认真负责地为亲身经历的党史事件提供相关史料。1978年9月5日，中组部沙洪同志写信给陈云，反映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中某些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分歧，若不适当地澄清，会影响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沙洪还附上徐懋庸夫人王韦的一封信，叙述了毛泽东在延安和徐懋庸的谈话中有涉及对“两个口号”争论的评价问题，还说徐懋庸在延安曾向陈云谈过这些事情。陈云看过这封信后，认为自己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了解一些相关情况，立即于9月11日写信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认真负责地回忆和说明了一些当年他知道的情况。^①难能可贵的是，陈云不仅身体力行地为正确评价“两个口号”争论提供了史料，并建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陈云注重史料积累的及时性，他督促这件工作最好当年就动手做，“因为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年龄都是七十开外八十开外了，再不动手就迟了”。^②根据陈云的指示，文艺局的同志拜访了周扬、茅盾、夏衍、阳翰笙、李一氓、丁玲、李何林、楼适夷、陈荒煤、沙汀、任白戈、林默涵等亲历者和知情人，抓紧时间收集、整理回忆和访谈文章，为全面客观反映当时情况、平息争议，提供坚实详细的史料基础。^③在陈云的鼓励和引导下，在对史料作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述单位还向中央提供为胡风同志平反的材料和依据。^④

西路军长期被错认为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涉及2万多红军将士的政治名誉。陈云主张及时集中电报、文件等相关确凿史料，以搞清楚历

史事实，为西路军问题平反。1981年、1982年，陈云多次与李先念谈话，指出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因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他还回忆指出：“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在看过李先念按照陈云建议搜集到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历史电报后，1983年1月5日，陈云亲笔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随即，李先念把陈云的信、自己写的说明和附件一并送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⑤党史上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客观公正的结论。

陈云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提供和积累党史史料时不突出自己的成绩，更不刻意回避自己的过错，体现了共产党人正视历史的宽广胸襟。1958年10月31日，陈云复信中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党总支，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商务印书馆工人斗争情况的问题，指出：当时商务印书馆工会虽然是上海的重要工会之一，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斗争仅是全上海工人斗争洪流中的一部分。^⑥20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编选陈云的著作。陈云要求把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自己向中央写的检讨报告收进去。这个报告检查了辽东土改中“左”的错误及其原因。编辑组认为这在当时带有普遍性，多次建议把这篇稿子撤下来，都被陈云拒

①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② 《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0—451页。

③ 荣天琦：《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百年潮》2005年第6期。

④ 荣天琦：《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百年潮》2005年第6期。

⑤ 《陈云年谱》下卷，第318页。

⑥ 《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绝了。陈云对秘书说：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①

二、求真务实地对党史史料进行证明、甄别

陈云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史事业的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在百忙之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历史细节加以尽心尽力的回忆，作出详细明确的甄别。

(一) 积极协助档案馆等有关部门甄别史料，尽可能准确还原历史过程

中国革命条件十分艰苦，造成早期革命档案留存较少，有的还缺乏互证材料，因此，亲历者的甄别对史料利用显得尤为重要。1982年，中央档案馆送来一件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档案，请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辨认。陈云十分审慎，丝毫不肯随意马虎。为了确定是否是自己的笔迹，他使用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先是拿给过去常替他抄写手稿的夫人于若木看，又把档案放着仔细再看。^②经过审慎核阅，陈云通过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③陈云还为其他党史史料开具了证明材料。这些书面材料清晰准确，成为史料甄别的有力证据，对党史研究与宣传大有裨益。1982年6月12日，陈云就长征初期任职等事宜复信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信中说：“长征初期我与刘伯承均由中央派往五军团工作，刘是红军总参谋长兼五军团参谋长，我任五军团中央代表。到遵义后，刘任遵义卫戍司令，我任政委，并参加遵义会议。但我未参加过黎平会议。”^④

由于时隔久远，不同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也不尽一致，因此，许多党史史料都需要反复甄别。陈云总是不厌其烦，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有关史料进行仔细甄别，并提出具体意见。1982年12月28日，陈云书面回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一些问题，指出

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工作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并明确说明董振堂没有参加遵义会议，自己没有参加通道会议。^⑤陈云的书面答复厘清了有关遵义会议回忆史料中的一些错讹、误解之处，有效地还原了历史真相。

(二)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借助史实阐明对党史事件的看法

陈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不仅提供党史证明材料，而且借助史实阐明对党史事件的看法。1977年9月，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党史陈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陈云针对陈列中有关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解说词指出：“‘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牺牲的人没有责任，而且，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⑥1978年9月，陈云给胡耀邦写信为徐懋庸作证，指出：“我确实记得毛主席讲过‘徐懋庸给鲁迅的那封信是错误的，但他还可教书’；而且，后来真的把他安排在抗大当了教员。”“（在延安时）我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的口号。”^⑦

陈云力主在历史情境下去分析和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尊重历史事实，作出客观评价。1983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罗荣桓传记组来信询问，应当如何反映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一些失误的问题。经过思考，1984年1月11日，陈云复信指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我们进入这个地区的时间不过几个月，敌人的兵力也有变化，因此，对东北的情况还处在认识的

① 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陈云年谱》下卷，第296页。

④ 《陈云年谱》下卷，第299页。

⑤ 《陈云年谱》下卷，第315—316页。

⑥ 《陈云年谱》下卷，第213—214页。

⑦ 《陈云年谱》下卷，第224—225页。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和战问题、作战方针问题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都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当时毛泽东给东北局的电报上提出的一些意见，而不应当把个别意见同实际情况不符说成是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有什么失误。^①对于辽沈战役中林彪作用的评价，陈云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指出：“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②

（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上，积极推动解决个人历史问题

陈云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早在1966年八九月间，陈云复信和接见来访的天津工学院的学生，证明该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历史上没有问题。^③十年内乱结束后，1976年11月25日，陈云在接到黄克诚夫人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疗眼疾的信后，立即转交给华国锋、叶剑英，并附信阐述自己所知黄克诚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此事很快被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得到同意，黄克诚的困难很快得到解决。^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兼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更加注重通过收集史料来澄清真相。1978年12月，陈云明确指出，刘少奇的冤案是党和国家的事情，他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同时，他充分肯定萧劲光的历史功绩，亲自给萧劲光的文集题写书名“一代元戎”。陈云委托廖承志和当年与潘汉年一起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有关潘汉年的史料。1981年3月，陈云在给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信中说：“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对于刘晓、刘长胜同志能在上海保存下来反面提供了潘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⑤

中国革命历程艰难，牺牲者众多。对于建党初期和隐蔽战线牺牲者的事迹，可资证明的书面材料非常少，就是知情者也不多。因此，少数知情人的证明就显得极其宝贵，有时甚至是唯一证据。陈云尽己所能，为他所知道的牺牲者作出复查证明和客观评价。这既是源于革命幸存者对烈士的深厚感情，也为党史留存了相关史料。1977年10月，陈云收到宗益寿之子的来信，反映十年内乱中其父亲和叔叔宗益茂的革命烈士称号被取消，请求陈云证明他

们革命历史问题。10月28日，陈云书面证明宗益寿及其弟弟宗益茂的革命事迹，认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⑥1983年8月8日，陈云为纪念任作民题词：“任作民同志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都曾与我共事过一个短时间，他是我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同志。”^⑦

对于年代久远且仅有一面或数面之缘的人物，陈云也力求详尽地认真回忆，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帮助澄清和解决个人历史问题。1983年7月12日，就四川仪陇县委来信询问该县席懋昭是否于20世纪30年代护送他出川一事，陈云复信说，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任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此后，陈云多次函电仪陇县委和四川省委，关心复查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来函说，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1935年确实当过灵关村的小学校长。12月20日，陈云亲笔为席懋昭写了证明材料，指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⑧对于自己不是很熟悉的同志，陈云也力图从多方面着手解决问题。1959年1月15日，陈云复信中共中央组织部转江苏省昆山县委五人小组，答复他们所问1930年农民中的党员人数和名字问题时，提出李一谔烈士的弟弟李新民可能对当年农民党员的名字还记得。^⑨

三、大力推动党史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

征集、出版党史史料，是党史存史工作的重要

- ① 《陈云年谱》下卷，第345页。
-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 ③ 《陈云年谱》下卷，第141页。
- ④ 《陈云年谱》下卷，第205页。
- ⑤ 《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页。
- ⑥ 《陈云年谱》下卷，第216页。
- ⑦ 《陈云年谱》下卷，第335页。
- ⑧ 《陈云年谱》下卷，第331页。
- ⑨ 《陈云年谱》下卷，第4页。

内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陈云对此十分重视，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要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根据他的意见，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一文，说明“伍豪启事”完全出自敌人之手，我党地下组织在其刊登后即采取巧妙办法给予了揭露。陈云对文章十分重视，认真审阅了全文和全部附件，并要秘书按他的意思起草说明，由他逐字审定。^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写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史料，因而史实确凿，极具说服力和史料价值。

党史回忆史料不仅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而且包含亲历者从各个角度进行的所思所想，在翔实反映历史全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云主张，应当对党史回忆史料及时加以征集出版，供研究者参考使用。1981年7月，中央宣传部与中央组织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遵循陈云的意见，由贺敬之主持建立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小组，有计划地对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重要历史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社科院文学所搜集60多位左联盟员撰写的文章，编辑出版《左联回忆录》一书，另外还编辑出版《“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两书。^②陈云对这批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始终牵挂在心，在百忙之中请秘书打电话询问有关上海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重大问题的材料工作办得怎么样，并要求阅看。^③陈云还建议党史亲历者和见证者多写纪念文章。1982年11月，陈云亲自致信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夏衍，请他写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夏衍欣然从命。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夏衍撰写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④

陈云注重党史史料征集、出版的科学性和权威性。1983年7月7日，陈云为《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8月上旬，陈云就编辑方针和方法问题同秘书进行了八次谈话，建议这本书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辽沈战役纪念馆合编。在了解到该书只是收录战役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后，陈云提出，可以加入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的回忆文章，使人们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辽沈决战胜利的经过，而且能够看到胜利的各种基

本原因。^⑤陈云注重这本书的权威性，建议一批曾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来主持编辑工作，“书编好后，要送中央军委、尚昆同志把关”。“改编的工作也许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不过，只要能把这段历史立全面、立准确，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⑥根据陈云的意见，该书进行了改编。为了说明辽沈战役国共双方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该书第十篇专门收集了原国民党四位将领的回忆文章，并附有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大事记、战斗序列、省军级干部名单和各种统计资料、要图。这部书为研究和了解东北解放战争尤其是辽沈战役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档案史料和回忆史料。

陈云还通过题写书名、馆名等方式，关心和支持党史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陈云鼓励出版多种形式的史料集，曾为《中国职工劳模列传》《向警予文集》《张浩纪念集》《孙冶方颂》等题写书名。1986年，陈云接到上海商务印刷厂的信。该厂在信中汇报了编写工运史和恢复厂名的计划，并请求陈云题写“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陈云不仅为他们题写了厂名，还题词：“发扬革命传统，做好印刷工作。”^⑦

党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清醒剂，客观准确地存史则是党史发挥资政育人功能的重要基础。陈云通过积累和提供党史史料、证明和甄别党史史料及推动党史史料征集出版工作，为党史存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在党史存史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作风，值得今人认真学习并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9）

- ① 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 ② 荣天琦：《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百年潮》2005年第6期。
- ③ 荣天琦：《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百年潮》2005年第6期。
- ④ 《陈云年谱》下卷，第310页。
- ⑤ 《陈云年谱》下卷，第324—325页。
- ⑥ 《陈云文选》第3卷，第329页。
- ⑦ 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